

- 当代日常文化研究系列 -

日常生活的启蒙者

Hermann Bausinger

Ein Aufklärer des Alltags

[德] 赫尔曼·鲍辛格 等 著

吴秀杰 译

- 当代日常文化研究系列 -

日常生活的启蒙者

Hermann Bausinger

Ein Aufklärer des Alltags

[德] 赫尔曼·鲍辛格 等 著
吴秀杰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Ein Aufklärer des Alltags

Copyright © 2006 by Böhlau Verlag Ges. m. b. H. & Co. KG. Wien Köln Weimar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4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roup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常生活的启蒙者 / (德) 鲍辛格等著 ; 吴秀杰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495-5310-5

I. ①日… II. ①鲍… ②吴… III. ①民俗学—研究

IV. ①K89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8431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何林夏

出 品 人: 刘瑞琳

责任编辑: 马希哲

装帧设计: 彭振威

内文制作: 陈基胜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960mm×1270mm 1/32

印张: 10.5 字数: 277千字 图片: 18幅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在其对话体的学术传记中，德国图宾根的当代民俗学家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 1926— ）被他的对谈者——两位四位学者（其中三位来自民俗学，一位来自历史学）称为“日常生活的启蒙者”。担当启蒙日常生活的角色，正是鲍辛格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从事研究、教学和与公众沟通时倾力致力的目标。在民俗学家鲍辛格眼中，日常生活一方面是“灰色的”，是一成不变循环往复的，受讲求实际、以实用为导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支配。另一方面，在飞速发展和更新的技术世界里面，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在相应地与时俱进。鲍辛格以及他的学界同行引以为己任的，就是去发现那些永远处于“变化中的恒久”（Dauer in Wechsel, 语出歌德）的内容，在对“灰色的”、常规性的不引人注意之事物的关注中，去发现人们如何在传承下来的秩序中构建个人的生活；在对习俗的历史变迁的梳理中去发现仪式如何规定着人的行为的文化图式，并让当事人的行为处于完全的不自觉之中；去揭示文

化性的因素以何种方式找到新的体现方式，让当事人看到在自己漫不经心、习以为常的惯常行为和思想背后，有怎样的文化历史渊源的驱动。一句话，去启蒙这循环往复却又多彩多姿的日常生活。

民俗学意义上的这种启蒙取向，对经验性的强调超过思辨性，对习俗的历史追溯不再以发现“沉淀的文化遗产”（versunkene Kulturgüter）和民族之精魂（Volksseele）为目标。正是这种“启蒙”精神，让德国民俗学走出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一步，即告别浪漫主义传统想象之下的“民间生活”的田园牧歌，告别民族国家兴起背景下民俗学所背负的意识形态重负，同时也告别在呵护抢救“传统”时市民阶层身上体现出的庸俗的浮躁与浅薄的热情。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启蒙，也是一种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回应：其目标是让普通民众反思性地看待那些习以为常的内容，进而形成对日常生活的自觉。

当鲍辛格这一代民俗学者将本学科的对象定位于“普通人日常生活”时，他们发觉自己别无选择地非告别本学科旧有的名称“民俗学”（Volkskunde）不可。在整个德语国家（包括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民俗学科范围内，不同的名称出现了：“经验文化学”、“欧洲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是几个广为人知的变体。各大学的研究所因为对学科的定位理解有所不同，所以各自选择的专业名称和大的学科归属也不尽相同。1968年的学生运动无疑为民俗学的转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七十年代初期，民俗学的专业认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被刷新的不光是学科的名称，同时出现的也是新的不同研究取向。有鉴于此，概观式地谈论德国民俗学似乎变成了一件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的棘手事。

尽管德国学术界自己摒弃了 Volkskunde 的名称，为了便于

与中国学术界语汇的对接，我们在这里还是采用了“民俗学”和“民俗文化研究”的概念。在这块色彩缤纷的园地里，一枝引人瞩目的奇葩便是被称为民俗学“图宾根学派”的路德维希·乌兰德经验文化学研究所（Ludwig-Uhland-Institut für Empirische Kulturwissenschaft），而这一研究所与学科的核心人物和三十二年的掌门人（1960—1992）正是赫尔曼·鲍辛格。所谓的“图宾根学派”，其实是个有大体一致学术取向的松散群体，在对民俗学的专业认同上，他们有基本相同的看法。他们所从事的民俗学研究有强烈的社会科学取向，并归属于社会科学门下，尽管文化是那里的主导性概念。它从现象学的角度切入研究对象，把日常生活理解为是可以被观察到的、活生生的过程，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它看重田野采风，同时也注重事物间的历史性关联。它不以厘清分析范畴为目的，却恰好利用诸如“日常生活”、“文化”等概念的流动性边际来创造性地开掘旧领域、启动新视野：方言的传承、日常的讲述、战争难民的新居社区中的家乡意识体现、外籍工人的社会和文化融入、时装的社会表达、民间节日习俗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大众传媒、通俗文学和流行歌曲、回忆与口述史材料的解读、造就地域和空间概念的历史进程，等等。“图宾根学派”聚焦在社会、文化和历史三者重合阈限内的日常生活。因此，对这样的日常生活的启蒙也是通向解读社会结构、历史进程和个体物质与精神再生产的出发点，是理解肩负文化重负、置身社会转型之中的“具体的人”之关键所在。

正是基于对“图宾根学派”传统的认同，我们意图将这一学派的经典之作收罗进“当代日常文化研究系列”。民俗学是一门本土性非常强的学科。我们翻译介绍德国民俗学著作的目的，不在

于引进某种理论用来解释中国的或者普遍性的民俗现象。正好相反，在与各种理论打交道时，民俗学者需要非常审慎，需要首先弄清楚“谁在怎样的关联中提出了怎样的看法以及为什么”这样的基本问题，才能避免生搬硬套，南橘北枳之虞。我们想要看到的是德语国家民俗学者面对社会转型的介入方式和思考方式。

但是这一系列译作不仅仅囿于“图宾根学派”的论著，甚至不仅止于民俗学著作。在德语国家的学术实践中，对“日常生活”的学术开采并非民俗学的专利，至少在史学界“日常生活史”的底层视角和倾左的意识形态不仅启动了许多先前被忽略的史料，也揭示了一些以前被遮蔽的社会关系。至少自阿格纳斯·赫勒（Agnes Heller）将日常生活引入哲学领域、在1978年发表著作《日常生活：一种解释人的自身再生产的尝试》之后，无论哪一种社会科学学科，再想对日常生活视而不见已难以成为可能。近十几年来，日常生活的概念在“历史人类学”的标签之下被历史学家重新拾起。尽管如此，德语学界的历史学与民俗学似乎并未因为共同的研究对象而彼此青眼相向。2003年，历史学家阿尔弗·吕特柯（Alf Lüdtke）在《历史人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日常生活史——来自行进路上的报告》的文章，根本未提及民俗学同行在日常生活研究领域里的贡献，而民俗学者则坚称，他们对日常生活的学术关注要早于历史学。

尽管如此，两个学科的共同之处还是可以被观察到。首先，二者的共同软肋是倾向于不自觉之中将日常生活（尤其在涉及底层边缘群体时）浪漫化。其次，因为对象本身的边缘性特征——把“不值一提”的小事奉为圭臬——这些学科本身也容易为其他学科所看轻。清醒的问题意识、能够以小见大的穿透力是这两个

学科得以立足容身的必要前提。从方法上看，两个学科都能与人类学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共鸣，“陌生化”这一人类学的护身法宝，也是民俗学和历史人类学两个学科都无法规避的现实，尽管它们可能在时间和空间的指向上及其程度上各自有所侧重。

正是出于学科历史与现状上的关联，“当代日常文化研究系列”将视野扩展到民俗学、历史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三个领域，将这些领域的精品著作、论文翻译成汉语，呈献给中文读者。我们定位的读者群体是从事民俗学、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从事地方文化工作的实践者和思考者，也包括那些对德语国家日常生活文化有兴趣深入解读的非专业读者。我们的目的是，以“他山之玉”来助中国民俗学以微薄之力，以便掀开粗砺而风化的岩层而发掘出里面蕴含的宝藏。中国民俗学本该成为关于人类文化与文明研究的理论试验场。在将文献与田野资料互补整合方面，中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学者大量吸收了来自英语、法语、日语民俗学、人类学的知识体系；历史人类学在汉语学术界也有长足发展，这一切都为中国民俗学整合不同学术传统、形成创新性理论生长点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本译著系列的用意在于再开启一扇望见德语学术风景的小窗。

德国学术之于中国学者，虽然遥远但并不陌生。许多哲学、社会科学大家的名字，从赫尔德到尼采，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从马克斯·韦伯到西美尔，从恩斯特·布洛赫、卢卡契到汉娜·阿伦特，从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到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这些大家学者的思想和著作都在中国学界获得了广泛的回应，更不用说像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经典之作了。这些作者也是当代德国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的思想源泉，日常生

活研究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读者会在这套德语学术系列中看到似曾相识的影子。

在民俗学、民间文学领域，德国学术与中国学术的早期接触也许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爱伯哈特对钟敬文先生的拜访。尽管近三十年来，两国学者之间各种交流接触频繁，但是对德国民俗学及其相关学科，我们仍然了解有限。“当代日常文化研究系列”的成形和出版深深得力于叶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沃尔夫冈·卡舒巴（德国洪堡大学欧洲民族学研究所）两位教授的支持和推动。2009年，叶涛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邀请，在德国进行学术考察，访问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及其他相关研究机构。沃尔夫冈·卡舒巴执掌柏林洪堡大学欧洲民族学研究所，虽然他本人并不从事中国研究，但是他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坚信要想理解欧洲化、全球化的文化进程，加深对中国了解、深化中德学界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他极力推进的事业。受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邀请，卡舒巴曾于2010年4月访问北京并发表四场学术演讲，并积极参加中国民俗学界的相关学术会议。我们寄希望于本译著系列能够为中德学术交流搭建一份通道和桥梁。

在中国的民俗学者与德语国家相关学者频繁交流、互动之时，东亚学术圈其他国家也开始对德国民俗学发生兴趣。鲍辛格的《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的日文版2005年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民俗学——从古典学到文化分析》的日文版也于2010年面世，而前文提到的阿尔弗·吕特柯关于日常生活史的论文被译成韩文于2006年在首尔出版。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让我们意识到，德国民俗文化研究著作对研究东亚社会的参考借鉴价值。

如何有效地介绍一个本身十分复杂的学科，是一件很让人感到力不从心的事情。学术翻译是个耗时费力的巨大工程，而我们能找到的、愿意并且能够做民俗学德语翻译的人力资源实在非常有限。在这样的条件下，书目的选择就成了至关重要的环节。作为本系列的主编，我当然应该对本系列的总体设想和书目选择承担主要责任。当然，这种判断和选择都只能建立在我个人的知识基础和阅读范围之上。为了避免出现重大失误，我诚邀卡舒巴教授担任本系列译作的学术顾问，他也欣然同意。我也希望形成一个由中国民俗学界同仁组成的编委会，以便能共同商讨相关事宜。叶涛是本系列的始作俑者，自然责无旁贷。巴莫曲布嫫、李扬和杨利慧都精通英语，谙熟国内外学界的人脉、动态和需求，有丰富的学术翻译经验。他们愿意携手共事，这令我感到非常欣慰。

最后，我还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刘瑞琳老师的仗义豪情，在没有任何出版资助的情况下，慨然应允出版这套并非没有（或者非常可能有）赔钱风险的译著系列。这套译著系列能在“理想国”中找到一方立足之地，也是我们的荣幸。

吴秀杰

2011年暮春写于柏林

目 录

译者序 “有一件东西，我看到了你却看不到……” / 1

访谈参与者及作者 / 17

以近求远，探幽日常：文化研究者赫尔曼·鲍辛格 / 21

路径 / 31

传统 / 58

不引人注意之事 / 87

转折 / 114

乡土 / 145

跨境 / 173

定位 / 198

回忆 / 221

文献目录 / 232

鲍辛格论著目录 / 246

译者序

“有一件东西，我看到了你却看不到……”

一

有一项猜物游戏，很受德国儿童喜爱。游戏是这样的：一个孩子选定一件大家都能看到的物品记在心里，之后他（她）先对大家说这样的一句套语：“有一件东西，我看到了你却看不到……”接下来他（她）就逐一描述这件物品的形状、颜色、特征等，游戏的参加者就根据这些信息来确定所指的是哪件物品，直到有人猜中。这个游戏之所以备受喜爱，不光因为它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限制，不需要特殊的场地、玩具，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游戏当中，孩子们总会发现一些习以为常但平时并没引起他们注意的内容，在惯常中得到惊喜。在德国的学术界，也有这样的一个学科和一群学者，其目标和使命就是去关注和解读那些日常生活中早被人们习以为常、根本不能引人注意的小事，向人们阐释这些微末之事的相互关联，揭示人们不自觉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和意义。

这就是我们习惯上笼统地称之为“民俗学”的学科。

不过,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在德国的大学里,这个学科的名称并不统一。在十九世纪末期,这个学科开始出现时,它被称为 *Volkskunde*,从字面上看几乎可以说是英语 *Folklore* 对应的翻译。在汉语中,*Volkskunde* 和 *Folklore* 都翻译成“民俗学”。但是,在德语语境中,对这两个学科名称的价值判断则有高下之分。直到今天,即便在英语文献中涉及德国的民俗学时,作者一般都保留使用 *Volkskunde* 一词,以示与英国 *Folklore* 一词所代表的内涵有所区别。1891年,德国民俗学者卡尔·万侯德(Karl Weinhold)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俗学应该承担什么任务?”的论文。在这篇文章里,他讽刺那些搜集各种民间口头传承和关于这些搜集内容进行写作的民俗学者们(*Folkoristen*)在从事一项“时髦的体育运动”,而属于 *Volkskunde* 的内容是这些所谓的“民俗学者”根本无法设想的:从事这种民俗学的人要“熟悉历史学和语言学,有(体质)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知识,了解历史上的法律问题,熟悉国民经济史、技术史、博物学史、文学史、艺术史,最为重要的是要有天生清晰的理解力”(转引自 Moser 1962: 177)。

尽管从事德国民俗学(*Volkskunde*)的学者特别强调该学科是一门严肃的科学,要有精准的研究与正确的方法,但是直到1933年,德国民俗学才在大学里获得第一位教授讲席,正式成为大学里的一个专业。毋庸置疑,民俗学的出现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因而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为纳粹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效力奉命的马前卒。因此,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Volkskunde* 这一学科名称遭到了多数大学的摒弃,取而代之的新名称有“欧洲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只有在图宾根大学,民俗学改名为“经

验文化学”。在整个德语学术界，“经验文化学”独此一家，别无分店，而伴随着改名的前前后后，该学科的内容和学术取向上也在不断进行着调整 and 改变。而发生在图宾根的民俗学转型的核心人物，也正是这本书的核心人物、图宾根大学的民俗学家或者说经验文化学家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 1926— ）。

本书是一本谈话体的学术传记，传主是赫尔曼·鲍辛格。与鲍辛格对谈的两代四位学者，都曾经就读或执教于图宾根大学，在学术上都与鲍辛格的经验文化学有或多或少的关联。本书初版于2006年，其出版契机是鲍辛格八十华诞纪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鲍辛格半个世纪学术人生的写照，也是当下在民俗学界活跃的中坚学者对半个世纪学术史的反思性回顾和关照。

先从本书的结构上说起。本书的七场对话各自围绕着一个关键词来进行，它们分别是“路径”、“传统”、“不引人注意之事”、“转折”、“乡土”、“跨境”和“定位”，每个主题各自成为独立篇章。对话之外，有鲍辛格的多年同事伯恩德·尤尔根·瓦内肯（Bernd Jürgen Warneken, 1945— ）撰写的导言《以近求远，探幽日常：文化学者赫尔曼·鲍辛格》，对鲍辛格的学术渊源、思想脉络和写作风格有精当描述；对话篇结束之后，有鲍辛格自己撰写的后记，题为“回忆”。这篇后记其实可以看作独立成篇的问题阐述，因为对回忆性文字和口述史资料的运用是经验文化学（民俗学）中经常出现的现象，而在此前的对话中没有专门涉及这个问题。鲍辛格指出，回忆的形式是块状的，回忆性的叙述总是不自觉地陷入一种自我辩护状态从而有目标地屏蔽某些信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正确的回忆”是不存在的，因此鲍辛格也提醒读者，在他的回忆叙述里，不经意之中总会露出为自己辩护、将自己美化的痕迹，毕竟这不是一

部“客观的”学术史,是一幅以“回忆”为主线拼缀而成的学术风景画。

与鲍辛格对谈的四位学者在年龄上呈梯队状,他们分成两人一组,分别围绕不同的主题词与鲍辛格对谈。其中一组是迪特·朗格魏舍(Dieter Langewiesche, 1943—)和沃尔夫冈·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 1950—),他们是六七十年代开始走向学术界的,主持的主题谈话是“转折”、“跨境”和“定位”三章。另外一组是古德龙·柯尼希(Gudrun M. König, 1962—)和伯恩哈特·彻费恩(Bernhard Tschofen, 1966—),他们分别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了在图宾根的求学研读生涯,主持的主题谈话是“路径”、“传统”、“不引人注意之事”和“乡土”四章。在这些谈话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三代学者在视角和思想观点上的些微碰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三代六位学者共同打造的、在回忆的基础上对图宾根经验文化学(民俗学)学术思想与学术实践的反思。

二

首先,需要谈到的是本书的核心人物鲍辛格。

在战后德国民俗学的发展进程中,赫尔曼·鲍辛格是最具深刻影响的人物之一,这是学界的共识。毫无疑问,一方面,鲍辛格本人的学术才能和成就让他实至名归,获得这份殊荣和尊崇。另一方面,某一关键学者的个人业绩足以左右一个学科的发展走向,也与德国大学的制度安排有密切关系。

德国大学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引入本科学位,这是最近几年为适应国际化潮流才出现的“新生事物”。此前,德国大学的文科教育是属于研究型的,大学毕业生取得的是硕士文凭。学制的

长短没有统一的规定，对学生的学业要求也完全由各专业自己掌握。在专业课教学方面，教授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教授的职位非常少，尤其是讲席教授，一旦获得任命，则为终身职位直至荣休。像民俗学这样的小学科，往往是“一个人的研究所”，即一个研究所只设立一个教授讲席，一位学术地位高、话语权重的讲席教授，自然而然就是研究所的所长，也是决定整个研究所学术取向的关键性人物，而一个学科日渐式微或者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仰仗着该学科负责教授的个人作为。鲍辛格就曾经带着这样的“一个人的研究所”一路跋涉过来。从1960年获得图宾根大学的教授任命，直到1992年荣休，前后三十多年，他奋斗在图宾根，踢打出民俗学的一片新天地，尽管他从来强调，人们应该注意到他的许多助手、同事做出了多么重要的贡献。在七十年代初，他们选择了将自己的研究所归于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系，将民俗学改名为“经验文化学”，并使其成为图宾根大学的一个“品牌产品”。直到今天，这个学科名称依旧，其基本宗旨亦未改变，只是规模扩大，已经有三位教授、一位特聘教授，以及十几位研究人员。

从事民俗学研究的人，大多来自底层社会，对民间文化有着切身的经验和经历。鲍辛格也是如此。和他的许多同代人一样，鲍辛格也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战俘营出来之后才开始踏上读书求学之路。假如没有邻居那位律师一直鼓励他别太考虑职业前途、专心去学习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说不定他就会选择读一所职业学校，早日学得养家糊口的手艺。从1948年起，他就读于图宾根大学德语言文学系。方言和口承叙事是鲍辛格从事民俗学研究的起点，但是他个人在战俘营的经历让他明白，审美意义并非民间讲述最重要的动机。在备受寒冷饥饿折磨的情况下，人们

更愿意讲述的不是传说中的拯救英雄，他们向往的也不是童话中的美好结局，相反，那些片段的、日常的、个人化的经验才是人们重复叙述的内容。1952年，鲍辛格完成题为《活态的讲述》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符腾堡地区东北部的民间叙事的存在状态。此后的几年，也是鲍辛格集中致力于发表民间文学研究论文的几年，他思考的问题都是比较宏大的、经典的民间文学问题，如通过《灰姑娘》谈童话的象征，围绕瓦尔登堡狂欢节谈民间传说与历史的关系，谈民歌与流行歌曲。这些只是鲍辛格学术思考的一部分内容。在写作民间文学研究的同时，他更多地思考着当代技术世界对民间文化的冲击和改变。1959年，鲍辛格完成教授论文（Habilitation），这是在德国大学里获得教授任职的前提。这篇教授论文提交给图宾根大学哲学系，被若干以语文学见长的德语言文学教授评议通过，于1961年正式出版，并成为民俗学告别语文学、转向社会科学的开山之作，这就是德国当代民俗学的经典之作《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

鲍辛格的学术生涯中关注的问题很多，这本学术传记的篇名中给出了其中的几个关键词。详细内容尽在书中，这里无须赘述。鲍辛格的个人学术历程，起步于民间文学，而后却“叛离”民间文学。我着重指出这点，希望这有助于理解图宾根民俗学转型的深层原因：民俗学完成从归属语文学到归属社会科学的转变，不是基于人事的变迁，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种选择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动力，是民俗学科积极回应社会意识形态的清算和反思、技术世界的突飞猛进、消费社会的形成等社会转型中一系列问题的结果。恰好在面对社会转型这一点上，中国民俗学当下的处境与当年鲍辛格和他的德国民俗学同行们面临的处境颇为类似，学科的使命